



制度及其演化

方法与概念

李建德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制度及其演化

——方法与概念

李建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李建德著.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432-2998-3

I. ①制… II. ①李… III. ①制度-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0691 号

责任编辑 张苗凤 忻雁翔

装帧设计 路 静

制度及其演化

——方法与概念

李建德 著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7.5

插 页 5

字 数 1250,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998-3/F·1219

定 价 258.00 元

推荐序：奇人，奇书，奇问

我认识李建德是在中国演化经济学会的年会上。他头发灰白、身板笔直、说话铿锵有力。我一问，方知他比我还年长三岁，今年已是七十有七了。

说他是奇人，第一奇在年长童心。别人都是退休安享晚年的年龄，他却还在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和前沿领域奋发耕耘，不知老之将至。第二奇在他经历曲折。李建德上大学时就对理工科感兴趣，却被分到农经系。读《资本论》上瘾，想发展马克思，却被打成“反革命”坐牢，依然对资本论的兴趣不减。别人看来，他应当是伤痕文学的典型人物，但他却用逻辑和科学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批评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第三奇在他的研究方法，既不是时髦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也不是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用最前沿的认知心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经济学，来探索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和逻辑问题，重新分析黑格尔、马克思、波普尔、哈耶克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本人自觉在跨学科的研究上走得够远，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问题都有所涉猎。但是，用前沿和未成熟科学如脑科学这样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古老的哲学经济学问题，还真是头一次看见有严肃的学者去做。更令人惊异的是，做这种尝试的竟然是年过七十、身居学术边缘地带的中国学者。这得有多大的定力！

说他是奇书，一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接近黑格尔、马克思、波普尔，而非目前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数理经济学。里面没有数据和数理模型，但是逻辑清清楚楚，令我想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此种经济学的研究风格，连亚当·斯密也没有如此逻辑清楚，只能是受马克思的感染。二是他的内容几乎涵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所有方面，其框架之宏大，在经验主

义传统的中国实属罕见。如果读的不是中文，我会以为作者是爱好哲学、喜欢构造庞大体系的德国人。三是在目前经济学的分类体系里无法界定他的类别，既非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不像是制度经济学，是否可以称为逻辑经济学？四是他的研究方法，并非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自娱自乐，而是观察时务，深研案例。他设计的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创生方案，在方法上和实践上，都超越孟加拉国小微信用银行的方案，让我拍案叫绝，全力向国内金融主管部门推荐。所以，他的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不是柏拉图式的象牙塔研究。

说他是奇问，是我把他的工作，归纳为一个方法论问题：新兴交叉边缘学科，如认知科学和复杂科学的研究，能否回答经济学的基本难题？例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议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信念有无科学基础？

我目前对神经元经济学还涉猎不深，对李建德的成果还不能下结论。据我所知，目前神经元经济学和复杂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性的探索，还未涉入经济学政策的争论。国内外至少有人用新兴交叉学科的进展来探索经济学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例如，复杂科学在演化经济学的应用，有人用分岔、突变、相变、涌现、序参量这样的科学概念，来描写东欧的转型和苏联的瓦解，也有人用复杂科学的方法来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稳定机制，都属于解读哲学上“量变引起质变”的科学模型，但是没有人尝试过把神经元与复杂科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上升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大脑”这样的哲学高度。

如果评价李建德的方法论，我认为他的特点，第一是高度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使命感，即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他坚定地支持马克思，而否定哈耶克。李建德的出发点，不是阶级斗争论，而是科学方法论。

第二是接受马克思的信念，要用科学来取代哲学，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置于科学而非哲学的基础之上。如果成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改名为马克思经济学，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要接受实验，包括历史实验的检验。苏联瓦解以后，重新恢复马克思经济学在知识界的信心，是一个极具勇气的理论创新。

第三，是难得的中国学者以平等心态来研究经济学的两个大家，左右对立的马克思和哈耶克，在研讨中又不失科学的客观性和对话的严谨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失去自己的文化自信。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超出马克思和列宁的预期。但是至今中国理论界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来提高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李建德的探索勇气，回到马克思的初心，即从哲学、科学、逻辑上探索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时俱进地引入演化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和复杂科学的最新进展来更新经济学的探索，最后从微观机制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论证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合理机制，从认知经济学的角度反驳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质疑。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目前在中国与西方，当属西方所谓的异端经济学界敢吃螃蟹的第一人。

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正好传来英国公投脱欧的消息。英国是亚当·斯密的故乡，自由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和资本论的地方。大英帝国的衰落史，见证了英美模式的衰落，也是哈耶克预言失败的见证。李建德能够平心静气地批评马克思和哈耶克的逻辑漏洞，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勇气，而且是学术根底。在这点上，李建德走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的前面。

我愿意在这里挑战下一代的经济学学子，假如你有攻占经济学基础的雄心和勇气，假如你对付目前经济学的主流课程游刃有余，那不妨来试读李建德的呕心力作，测试一下你的逻辑分析和科学直觉，能否来一次经济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及脑科学的对话。无论你赞成还是批评李建德的著作，我相信你都会大大增加对经济学问题、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方法的兴趣，从而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限制，走向全球化、信息时代、多元视角的新经济学。

中国的学术传统，写序言当然要美言作者的努力。但是，作为用复杂科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我也有责任提出我不理解的问题，向李建德求教。我觉得李建德对社会主义和科学的信念，可能高估了波普尔要求科学理论可以证伪的能力，低估了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哲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困难。

我个人以为，李建德对哈耶克的批评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劳动分工虽然导致个人层次上的知识分离，但是由此来否定人类计划的可能性是错误的。现代的摩天楼、铁路、登月飞船、卫星导航，以及秦始皇的郡县制、英格兰的中央银行、普鲁士的义务教育和福利系统、美国的联邦制和托拉斯，哪个不是人类设计的经济组织和政治制度？渐进自发组织和关节点的顶层整合是互补而非对立的演化机制。如今，跨国公司的力量超过中小国家，跨国公司内部的计划程度，远超苏联的计划经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和计算机的订单生产，大大提高了市场经济的计划成分。所以，李建德指出，认识论不是列宁简单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是神经元基础上构造的认识世界的模型。现代复杂科学和整体论的思维，在个人分立知识的基础上，有构造“社会大脑”的可能。这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

我的保留意见是，李建德忽视了“瞎子摸象”意识到的认识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在多元竞争的开放社会和共生演化的过程中，“社会大脑”（=社会共识）的演化未必是均衡论的收敛过程，而可能是非均衡论的发散过程，也就是可能出现几个社会大脑竞争共存的格局。个人在选择社会大脑的时候，依然不能避免哲学倾向的指导。换言之，无论是原子论、神经元论、演化论还是复杂科学，都不能断言科学将会取代哲学倾向或宗教信仰。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当代科学与宗教同时兴盛的“怪象”。因为，任何时代的科学都只是相对真理，对复杂世界的把握永远具有局部、近似的性质，从而永远无法消除几家竞争的格局。

在这个意义上，李建德从“等价交换”和“互利双赢”原则出发，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带有科学假说的性质。因为“等价交换”和“供求关系”一样，潜在的价值和供求无法直接观察测量，它们和中医的阴阳概念一样，只是隐变量。国际分工是不平等

的，美国垄断高科技的领域，不可能有等价交换，例如中国企业购买芯片受西方禁运的限制，不得不付出不合理的高价。考虑交易成本的复杂性，只增加剩余价值的测算困难，却不足以否定剩余价值存在的理由。剩余价值是分工和剥削的经济基础，是显而易见的直觉，因为“资本家无利不起早”。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相比，完全是违背常识的。因为优化的结果是利润率为零，哪家企业可以生存？哪个资本市场能接受零回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纯属线性数理模型构造的“空想资本主义”。

但是，马克思要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测量剩余价值，在操作上是不可行的。马克思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在全球开放竞争的格局下，只考虑分配不考虑国际竞争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而成为西方经济学批评的对象，而在指导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上的实际效果，也是值得探讨的。从方法论上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演化论的，但是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又是均衡论的概念，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共同之处，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才发展出描写非线性非均衡的数理模型，用来理解生命起源，我们到20世纪80年代，才运用非平衡态物理学的方法，逐一破解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难题。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老牌工业革命国家英国会输给后起的德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苏联瓦解而中国崛起，技术革命和产业的新陈代谢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开放竞争和产业代谢的条件下，只有成熟产业可以测量产业平均的劳动时间和经济效率，极具不确定性的新兴技术或衰老产业的经济前景都无法预测，如何能测量可持续的经济效益，谈论可能湮灭或淘汰的产业平均劳动时间有何意义？反倒是毛泽东观察到的“农村包围城市”，比生产力发展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有更多历史案例的支持。换言之，老子和孙子的自然辩证法，比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辩证法，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当然，要把中国人的智慧改造成西方可以理解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就得超越李建德目前已经达到的高度了，那就是，要超越马克思和哈耶克，还得整合老子和孙子的方法论。

我们期待李建德初吃螃蟹的尝试，将来能带动一代年轻人来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视角，并融入世界学术之林，成为新世纪的思想盛宴！

也期待中国的出版界和理论界，能鼓励李建德这样的原创性探索。在开放竞争的时代，有争议才有新意。有百家争鸣，才能使中国学术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本人愿意和李建德分享探索的风险与快乐！

陈 平

2016年5月11日，初稿于上海南翔浏翔花苑

6月24日修改于武汉，闻知英国脱欧之后

2018年11月4日定稿于上海南翔

前言

本书是《经济制度演进大纲》（李建德，2000，以下简称《大纲》）相关内容的扩展版。我在《大纲》的后记中曾说：“我要诚实地告诉读者，本书还很不成熟，这也是我称之为大纲的原因之一。仅我手头已经收集并与本书密切相关的中英文文献，就不下几十种。我实在很想消化了这些文献后再定稿。不过，到那时，一定又会有很多甚至更多相关成果，那将永无终期。”（李建德，2000，第 569 页）

这里所说的文献，首先是关于合作的。虽然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合作才是人类的特殊本性，因此，合作应该是制度研究的题中之义，不过，我也由此而意识到，一旦引入合作，将导致《大纲》结构的重大改变。于是，我有意识地不去阅读与合作相关的文献，留为此后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由于还没能清晰地认识到制度的实质是保证合作得以形成并能重复实施的装置，而不论其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或其他，才会在书名中有了“经济制度”这一不准确的措词。

其次，有着大量的生物演化论的文献，我决定暂时停止阅读与演化论相关的文献，因为那不是一时能读完的。此后，更有社会生物学、基因—文化协同演化等理论领域的书籍及其中文版，通过深入的阅读，使我自知当时对演化的认知也是有缺陷的，这才会在书名中采用了中文的“演进”这个词。可见，“经济制度演进大纲”这个书名，既反映了当时我对制度性质存在的误判，也反映了自己对演化认知的局限。

《大纲》出版后这十多年中，除了上述文献之外，我的重要进展是认知科学相关文献的引入。其实，这是制度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领域。这不仅

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而且该领域的文献浩瀚，更在于这个领域的文献对现代社会科学是如此重要，社会科学理论必将被认知科学根本改造：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分支都要经受认知科学的检验！

现在，我终于能兑现在《大纲》的后记中所做的承诺了：“我应该而又可以做的是在适当的时候对本书作一次修订，以弥补现在之不足。”不过，目前所完成的工作，只是《大纲》中关于概念与方法的部分。

由于内容的大幅拓展，新版的书名一度使我难以确定。我有几个选项。首先，可以把书名定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与概念”。我当年（1962年）会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就是认为与《资本论》相比较，那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不是科学的。几年之后更发现，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涉及对未来社会的种种判断；于是，只有在认识到人类与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又将去哪里之后，也即只有发现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并概括出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后，才可能以这些规律为依据，对后发展国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给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也就是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对历史上某些人类社会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更需要把握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如果以50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来概括出规律性认知，而后，依此进行不到100年的预测，其可靠性就相对大多了。然而，这是当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仍然不是很理解的。虽然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本人提出的学科，而且，他还亲自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开篇，然而，目前国内各大学都还没有这个专业的设置，我甚至一直找不到研究中的同行。从面对读者的出版物而言，这个书名显然还不合时宜。

另一方面，认知科学的发展已经能够对个体的行为意向和群体的共享信念的形成有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社会科学到了如自然科学在16—17世纪那样逐步摆脱对哲学假说（如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依赖一样，需要逐步建立在科学假说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认知科学既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成就之上，而其成果又必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认知科学终于有可能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接起来，这就使创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成为了可能。所以，我曾考虑过采用的书名为“认知科学的历史观——方法与概念”。但是，由于认知科学的文献在社会科学界还不很普及，在目前条件下，读者从书名难以获得本书内容的正确向导。所以，至少在目前还不宜使用这个书名。

最后，还是确定以“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为书名。科学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当然是关于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于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也就是人类社会中基本制度（也称元制度）的依次出现以及与生产的技术结构、分工结构的共生过程。同时，制度是人类社会中反复出现、相对稳定的现象，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值得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制度的相继出现以及各自的演化。因此，认知科学历史观的历史，正是制度的演化史。所以，“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这个书名，既涵盖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也包含了认知科学历史观所要表达的主要意蕴。

方法与概念的论述只是《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本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还必须把各个元制度依次出现的具体过程，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并由此验证本书所提出的方法与概念的可靠性。这任务是穷我毕生也不可能全部完成的了，但是，我会认真而愉悦地持续探寻下去。

我得对本书的篇幅过长而向读者表示歉意。其实，我也深感无奈。一个原因是该研究领域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乃至传统社会科学的范围，认知科学、演化论、宇宙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方法与概念，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为了兼顾作教材之用，不能不适当承担一部分的科普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我必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尽可能严格的论证，必须对我所提出的各概念与方法进行比较充分的论证，更要对这些概念与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在青年时代就有可能提出新思想、新方法甚至新理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得多，研究者不仅需要阅读海量的文献，还必须有更多的社会阅历以及对社会的深入理解，所以，在青年时期很难产生重大的成果。《大纲》发表时我已经 60 岁了，依我在该书出版后的真实体验，很少有学者会对我所提出的重要命题进行直接的否定或肯定，于是也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学术争论，更不必说是关注了。但是，争论是必将发生的。因为所处的环境，我一直不是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教师；在现实中也并没有愿意和我真诚合作，并在概念与方法方面与我比较一致的学者。因此，我需要把我能够考虑到的未来争论，在书稿中尽可能给出足够充分的说明。所以，我的第四稿还只有 50 多万字，到正式交给格致出版社的第六稿时就成了现在这个篇幅了。

二

《制度及其演化——方法与概念》以认知科学为基础，从中得到了联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四个基本结论。一是开放式地重新定义了存在与意识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从而使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既是认知科学的结论，又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规则。二是讨论了个体的意向性信念是大脑神经网络结构的涌现，而个体信念则是制度的基础，从而直接对接了认知科学与制度经济学。三是分析了人类文明的唯一源头是个体的理性建构，并由充分自信的理性主体敢于付诸实践地创建，这不仅为人类文明的演化提供了认知科学的解释，也颠覆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四是发现了哈耶克“知识的分立”的神经网络结构基础，指出现代智人的个体生存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大脑，从而超越了主要依赖个体大脑的智人，从此人类演化的压力主要不再由基因承担，也不再由个体大脑来承担，而是由社会大脑所承担，同时也彻底破除了哈耶克个体主义方法的认知基础。本书进而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虽然在精确性、可预测性与复杂性等方面有程度上的区别，但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批评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两元论，论证

了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

存在着的人类社会是演化的，存在着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因此，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科学命题出发，分析人类社会不仅需要演化方法，而且需要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是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从而相互弥补了这两种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时各自的不足。

应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本书证明了人类社会演化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指出了人类社会的演化是基因的演化（达尔文过程Ⅰ）、神经网络结构的演化（达尔文过程Ⅱ）和文明的演化（达尔文过程Ⅲ）的共生演化；其中神经网络结构是基因的表现型，而人类文明则是神经网络结构的表现型。这一命题修正了人类是基因—文化二元共生的演化论，并彻底清除了现行文化演化论中的拉马克主义。二是提出了人类社会在物质资料生产历史阶段中的基本结构是生产的技术结构、分工形态和制度结构的共生演化。生产的技术结构决定着输入人类社会的能量与物质的状况，是人类社会得以演化的基础性环节。生产的技术结构决定着人类的分工形态，并由这两者共同决定着制度结构。这也就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当代版本。

本研究进而发现了人类社会结构中有着与复杂系统理论中序参量、涌现、负熵和分叉等四个概念的对应关系物，从而可以在信息被大大压缩的条件下，对人类社会进行高保真的刻画与分析，并在理论上证明了对人类社会进行有限预测的可能性。

人类社会演化历程中，已经出现了5个依次出现的互补的序参量：自直立人以来，人类都是“早产儿”导致亲代投资的高度稀缺性，由此形成血缘组织内的分工，以及使该分工具有可持续性的家庭制度；从事不同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以及保证这一分工可持续并分配合作剩余的市场制度；自愿提供共用物品的分工，以及保证这一分工可持续并分配合作剩余的自愿性组织制度或称自治制度（其最早的形态是部落联盟）；强制性提供共用物品的分工，以及保证这一分工可持续并分配合作剩余的国家制度；从事重复性和应对确定性的劳动与从事创造性与应对不确定性的劳动的分工，以及保证这一分工可持续并分配合作剩余的企业制度。这些互补性序参量是决定人类社会结构的基本序参量，它们的依次出现，是人类社会复杂性逐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阶段，则发现了依次出现的具有替代性的3个序参量：武力、土地、资本，这些序参量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原因。目前，更具生产力的知识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不同知识要素拥有者之间直接分工以及保证这一分工可持续并分配合作剩余的是公司制度和自治组织制度。知识对资本而言，又具有替代性。当前，知识对社会的支配意义正不断增长，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未来的社会结构将由知识这一新序参量的生产与消费的特殊性所支配的自治组织一统天下，这正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现代表达。

每一种序参量的出现，也即每一种分工的出现，都导致了新的多赢，即每一种分工都达到了整体收益大于分别收益之和，这就是涌现；这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总体而言是合作的群体，而且，正是合作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而基本序参量的相继出现，使人类的合

作越来越为广泛，同时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可逆性。

在序参量支配下，事物的演化具有遍历性，即该事物必然会发生；在非序参量支配下的事物，则具有非遍历性，或称为是路径依赖的。于是，在序参量支配下具有路径依赖的事物出现后，只要时间足够长，该事物都会转变为遍历性的。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序参量的出现，都重演着这一过程。

人类个体之间都为实现合作而互动，因为合作才能有涌现，而参与合作才能参与分享该涌现的合作剩余。制度正是个体为获得合作剩余的不同信念互动的结果：本研究把个体互动的随机稳定中，有利于合作的信念定义为社会规范；从而进一步把制度理论牢固地建立在认知科学的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相互关系基础之上。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新的技术结构条件下，追寻新的分工与合作形态，并在互动中形成新的制度结构的过程。在形成新制度形态时必然伴随着总制度成本上升，而由于能从新的合作中获得高于成本支付的合作剩余，就会伴随着平均制度成本下降的趋势。平均制度成本的下降，正是负熵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社会结构日益有序化的表征。这不仅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不可逆性，而且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个体自由度趋于减少的必然规律，从而揭示了自由主义对未来的信念是乌托邦。

在相同的序参量支配下，社会结构是稳定的。只要时间足够长，个体对静态的社会结构有可能形成相应的预测能力。当新的序参量出现时，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性质的变化，这时，人类社会将出现新的分叉。只要新序参量的出现能够被发现，那么，该序参量在形成支配作用之前的过程，即在分叉出现之前的过程，具有可预测性；而分叉之后的社会结构则是不可预测的。这对人类社会演化的可预测性作了明确的界定，并明示了人类未来社会结构的基础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由知识这一序参量支配的结果，是具有遍历性的，因此不仅具有可证伪性，也是可预测的：这是科学的假设，而不是乌托邦。

以上，既是制度及其演化的基本架构，也是认知科学的历史观的基本结构，还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我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对上述假说展开数百万年人类历史的具体检验。

三

从自己树立了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已经是第 57 个年头了。在这条漫长的研究之路上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已经在《大纲》一书的后记中感谢了的之外，我又欠下太多的情谊。

我首先得深深感谢江西财经大学的伍世安先生。是他在自己的职位上承受着压力所做的几件事，延续了我的学术生涯，使本书稿可以尽早完成。《大纲》出版后，时任书记的伍世安使用了自己所分管的经费，支持我为扩大该著作的影响而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当我

到了规定的年龄时，学校按程序给我办了退休的手续。不久，江西省政府参事室建议我任参事。按规定，参事应是在职的岗位。我把这一情况告知伍世安先生后，他很快就恢复了我的在编手续。这样，我才能在60岁之后，任了两届江西省政府参事，并以参事的身份继续从事社会调研，加深了我对现实的理解。继续工作的我，很愿意参加各层次的教学，但是每年度必须完成的研究任务不能不影响我的深入阅读和思考，以致严重影响了我对“无用之学”的研究进度。正在这时，我有机会去江西师范大学任终身教授，从而可以摆脱这类每年必须发表若干成果的任务。我向伍世安提出我的期望后，他同样很快就按程序办理了我的调离手续。我知道，因为我是调去在经济学领域远不如江西财经大学的单位，会由此而产生不佳的舆论；而学生们更是反对我的离开，并在校园网上造了不小的声势。但是，伍世安一直默默承受着这些压力，支持着我的期望。我把一直没有向他当面表达的衷心谢意，宣示在这里了。

我去江西师范大学任职一事，很值得在这里说说。2003年江西省银行学校决定并入原来没有经济类、财经类专业的江西师范大学。时任江西师范大学书记的游海先生邀请罗来武先生出任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财政金融学院院长，而罗来武先生以调我任职财政金融学院作为条件之一，游海先生同意了该条件。关于聘任相关合同的谈判及其具体内容，事前我一无所知，至少，我没有提出过任何条件；直到签字时我才知道我受聘为“终身教授”，因而没有每年考核的条款（虽然保留了总的考核要求：受聘10年，出版书两本）。真不好意思，受聘16年后，也即现在的这本书，才是我对江西师范大学聘任我的学术汇报。我今天能够完成本书稿，特别需要感激的是当年的游海书记和罗来武副校长的这一“终身教授”的聘任！我真诚期望国内大学能广泛实施国际经验已经证明颇有成效的“终身教授制度”，让经过激烈竞争显示出以研究为自己终身事业的学人，不再受困于每年的考核，而能安心思考真学问。

我在江西师范大学期间，找我个人正式谈过话，并表达了关怀的校领导除了上述的之外，就是时任校长的梅国平先生了；感谢他的多次鼓励，以及尽他所能安排好与我相关的事务。财政金融学院的各任院长，即罗来武离职后的吴永明、陈运平都对我有特别的关照，让我能安心于研究。按入校的合同，允诺给我配备一位秘书，于是先后有程芸女士任该职一年、程雯女士任该职两年，为我分担了不少学术中的技术性工作。合同允许给我配备两位助手，却只有许丽女士承担过这份工作，直到她去读博。我衷心感谢她们的帮助。回想起来，配备秘书与助手这种方式，在现行考核制度下，远不如终身教授对思考纯学术问题的助益，而且，在现行体制下也无法具体实施。所以，在几年后，这两条措施也就不再实行了。

本书稿的完成，与诸多学者对《大纲》一书的学术评价是高度相关的。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周业安先生发表了关于《大纲》的第一份书评。在伍世安先生和张曙光先生的共同支持下，由天则研究所安排在双周座谈会上对《大纲》一书进行过讨论。之后，在罗来武先生和张曙光先生的努力下，江西师范大学和天则研究所于2004年8月28

日借北京广州大厦举办了《大纲》一书的读书会，出席的有（按姓氏拼音排列）党国英、刘治彦、罗来武、茅于軾、汪丁丁、吴易凤、项启源、姚洋、余大章、张军、张立宪、张曙光、张宇、张旭昆、赵人伟等。这份名单显示了主办者力争出席者尽量包容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倾向的学者，以期获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意见，以利于我能更深入思考相关问题。我衷心感谢组织者的支持与全体出席者的宝贵意见。

思想史领域的资深学者张旭昆先生在会后发表的书评中，对《大纲》中所提出的“各历史阶段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制度结构”，建议命名为“李氏定理”，这是学术界对该著作有着原创思想的明确认可。这是对我继续深入研究的极大鼓励。他所认可的“定理”，在本书中有着更深入的拓展。

我和孟捷先生多次交流过各自的学术观点。他是一位善于思辨者。由于所阅读文献的主要领域各不相同，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启示与灵感。他曾戏称我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我深感荣幸！因为，这一称呼至少认可了我“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和他一样在认真思考在当代应该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论思考得是否正确。更由于我参加了他作为秘书长的几乎各届政治经济学年会，在会议中结交了不少同仁，吸取了不少好思想，启发了我的思路。我还参加了几乎各届的制度经济学年会；当知道有了演化经济学年会后，我又参加了此后的每届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以及会上会下的议论都给予我众多的启发。黄凯南先生是一位有为的青年学者，在我参加的历届制度经济学年会或演化经济学年会上都和他有思想的交流；他对文献的梳理与对模型的把握，常常给予我启发；我多次向他请教我自创的术语如何准确翻译成英语，他都给予我满意的回复。还有众多的学者与我的交流，就无法一一致谢了。

在某次政治经济学年会上，我在大会上对文化决定论的批评发言（基本内容已纳入了本书的4.4.3部分）后，与会的史正富先生表示，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地调研的学术工作值得给予资助。我感谢他的这份心意。

关于本书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陈平和陈昕两位先生。本书基本结构的完成是以第四稿为标志，那是2011年。该稿我打印了三份，其中的一份给了当时我已经认识了几年的陈平先生。陈平先生欣然同意推荐本书，还痛快地同意为本书写序，并且不久就交了稿。他对我进一步修改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建议：一是需要明确本著作是基于什么科学的历史观，否则就与此前的科学历史观难以区分了；由此，我明确了“认知科学历史观”这个重要概念。二是必须十分明确并强调著作中的原创观点，这使我在以后的阐述中，尽可能明确并努力概括自己的原创思想。我努力做了，至于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则是我的能力不足。其后，是陈平先生把我给他的打印稿转给了时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陈昕先生。我早知道陈昕先生在经济学出版界的影响力，但一直没有机会相见。不想，陈昕先生竟然看完了我的书稿，并且约我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在80年代出版了一些理论性专著，后来，主要就是出版实证性的著作了。现在看来，还是得有人研究基本原理。你的书是这个领域的，不论有没有资助，我们都会支持。他还即时落实了出版的相关事宜。

只是等我读完必须把握的文献并把笔记整理为第六稿时，已经是2016年4月了。此时，陈昕先生已经退休，出版社的人员也已发生了大的变动。令我感动的是，陈昕先生负责地为我安排与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先生、副总编辑忻雁翔女士会面，落实了相关的出版事宜。责任编辑忻雁翔和张苗凤认真、细致、严谨和负责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纲》出版后，先是在江西财经大学，之后在江西师范大学都是作为我给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候选人上大课时使用的指定教材。我已经在教学中引入了认知科学，需要讲述一个学年。我在两校都指导过若干位硕士生。在课堂与课后，与学生们的交流对我理清学术思路都有着重要的帮助。

为了加快我的研究工作，在没有学术秘书后，我请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本科生以勤工助学的方式帮助我进行文献录入的事务。帮助我做这项工作的先后有陈方舟、范安、郭高娣、柯茜、李彩宁、李丹、盛玉婷、熊卉，以及校外的陈美萍、艾曾佳洁等，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这加快了书稿的形成。

总之，本书的出版凝聚了无数人对本人与本研究的关心与支持，我真诚地向每位支持与帮助者表示无尽的感恩。

当然，书中所有的不足甚至错误都是我的责任。

2019年3月21日于南昌青山湖畔

目 录

导 言	1
第 1 章 个体认知与社会意识	21
1.1 个体意识	25
1.1.1 外在感觉	25
1.1.2 内在感觉	39
1.1.3 自我意识	43
1.1.4 认知模式	46
1.2 个体认知	49
1.2.1 行为决策	50
1.2.2 意识与非意识	56
1.2.3 学习	68
1.2.4 语言	79
1.2.5 思想自由	92
1.2.6 存在决定意识	101
1.3 社会意识	124
1.3.1 认知他人	124
1.3.2 共有意识	146
1.3.3 社会大脑	159
1.3.4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163
第 2 章 认知科学的历史观	172
2.1 元规则	173
2.1.1 科学研究纲领	174
2.1.2 元规则	182

2.1.3	元规则的意义	190
2.2	硬核的结构	199
2.2.1	排除哲学命题	199
2.2.2	多层次分析	226
2.2.3	小心求证	240
2.2.4	建构与演化	255
2.2.5	因果与复杂性	264
2.3	外围保护带	269
2.3.1	在实践中调整	271
2.3.2	吸收一切文明成果	274
2.3.3	回应学科的发展	278
2.4	科学研究纲领的深化与退化	287
2.4.1	劳动价值论尚需完善	287
2.4.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待深化	296
第 3 章	稀缺及其适应	308
3.1	稀缺	309
3.1.1	稀缺的普遍性	309
3.1.2	稀缺的相对性	315
3.2	适应性行为	323
3.2.1	适应的行为模式	324
3.2.2	达尔文过程 I	331
3.2.3	达尔文过程 II	336
3.2.4	表现型	342
3.3	动机与目标	358
3.3.1	自利与利他	358
3.3.2	需要、偏好与效用	372
3.3.3	幸福	385
3.3.4	使用中物品的性质	398
3.3.5	平等	410
3.4	实现适应的方式	433
3.4.1	理性	433
3.4.2	小结: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446